



《黄亭子札记》

从历史中走来（下）

王凤生

吴印咸用这台摄影机在南泥湾拍摄了延安军民大生产运动的影片《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他请毛主席在片子里出现，那个镜头就是后来在片子里看到的，主席在铺好的白纸上挥笔题写“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八个刚劲有力的大字的情形。拍摄工作结束后，他（指毛主席）对我说：‘我的这张题词就送给你吧！’用这台摄影机，吴印咸将中共七大会议全部记录下来，那是我们党历届代表大会第一部完整的文献资料。

吴印咸还用他手中的相机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历史图片资料。延安时期，他拍摄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的许多照片。毛泽东建议他拍摄的“延安文艺座谈会”的集体合影，成为一份珍贵的历史文献。

1939年10月20日，在晋察冀边区，孙家庄村外的小庙里，他拍摄的白求恩为八路军伤员做手术的照片，成为了闻

名中外的杰作和革命史料中的重要文献。为了拍摄白求恩，他和他的摄影队与白求恩做了将近两个月的邻居。他和白求恩成了朋友，“闲暇时，白求恩大夫爱和我谈论摄影，我们共同探讨战地拍摄的技术技巧。”他是这样描述拍摄那张照片的经过的：小庙里白求恩

大夫在抢救伤员，敌人的枪炮声越来越近，震得小庙簌簌落土，已连续工作三十小时的白求恩毫无倦意，仍然不肯离去。

“当他弯着腰，聚精会神地在台上为一个腹部受了重伤的战士做缝合手术时，我举起照相机，利用夕阳微弱光线的照射，以中国特有的古庙作为衬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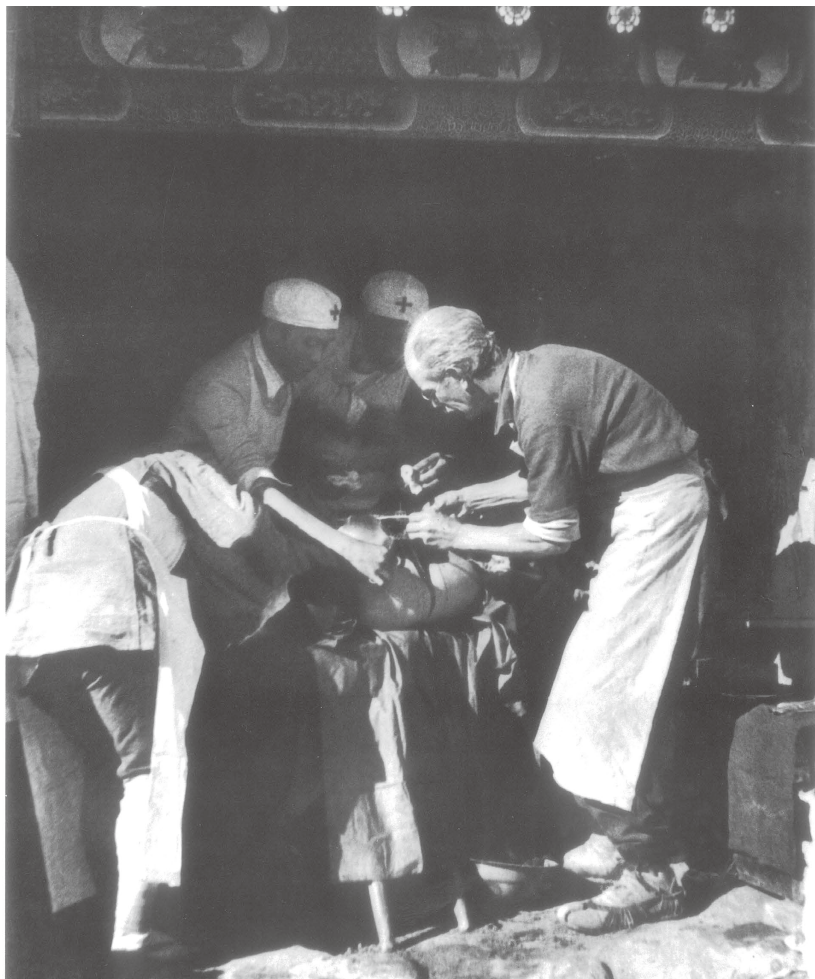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大合影（吴印咸摄）

将白大夫的这种感人形象记录下来。”“就是在这次抢救中，白求恩大夫划破了手指，不久又在手术中中了毒，于11月12日不幸以身殉职。”

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拍摄白求恩大夫抢救伤员照片的还有另外一位，那就是从1979年开始任电影学院副院长的罗光达同志。比较两张照片的构图、光线、拍摄角度都非常相似，不仔细甚至都分辨不出是两张照片。罗光达同志在他的“白求恩抢救伤员照片的拍摄经过”中写道：“不久，延安电影团吴印咸同志，带着手提电影摄影机和照相机也赶到了小庙。我们相见，非常高兴，但大家都没有多说话，各自集中注意力拍照。”

1956年6月1日，国务院批准北京电影学校改制为北京电影学院，吴印咸同志即被任命为副院长，兼摄影系系主任。在人才培养上，他强调基本功的训练，强调学习电影摄影首先要将图片摄影学好，重视学生的思想工作，重视师资队伍的建设。他的教育思想为电影学院，特别是摄影系的教学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影响深远。夏衍同志1985年1月4日在电影学院的一次会议上说：“特别是摄影，这几年进步是很快的，恐怕比导演、比表演方面还好一些。这不能不归功于电影学院培养了一批人才。”

1993年7月，《吴印咸摄影作品珍藏》出版，内有彭真同志题词，林默涵同志作序。



1939年，白求恩大夫在给伤员做手术（吴印咸摄）

他送我一本，并签名“吴印咸一九九三年十月”。我珍藏至今。

1994年9月7日，那一天上午，我正在参加北京广播学院（今天的中国传媒大学）的校庆活动，得知吴老于当日早晨不幸在家中去世。他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钟敬之同志是另一位对电影学院的创立与发展做出过突出贡献的人，也是我到电影学院后与之交往较多的一位老领导。一是逢年过节总是要去他家中探望的；另外，尽管年迈

在轮椅中生活，但他仍坚持为国家、为学院做事，工作中的交往自然就会多些。我珍藏的他给我的数封亲笔信，就是他为国尽力，春蚕至死丝方尽的有力见证。

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他是左翼作家联盟的成员，左翼剧联的骨干。在延安，他以文艺为武器，投身伟大的抗日洪流。他参加过延安文艺座谈会，亲耳聆听毛泽东的《讲话》，并积极践行之。

1938年初，他到达革命



罗光达（1939年摄于晋察冀军区）

圣地延安，是鲁艺戏剧系的教师，担任舞台美术方面的教学。1941年起担任鲁艺实验剧团主任。他曾担任苏联名剧伊凡诺夫的八幕话剧《铁甲列车》和苏联作家包哥廷的革命史剧《带枪的人》的舞台美术设计。他参与了中共七大会址，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的设计。“七大”会场，主席台上毛主席、朱总司令的画像由他亲手画就。

《带枪的人》中列宁的形象是第一次出现在中国的舞台上，是由于学伟饰演的。据干学伟回忆，1942年，延安时期，周恩来看过他饰列宁的剧照，直到1961年6月在新侨饭店的电影创作会议期间，周总理还关心地问他：“怎么这几年没见到你的片子？”干学伟是1956年北京电影学院初建时的导演系第一任主任教师。

钟敬之同志1955年夏被任命为学院筹备小组组长，之

后他便走访了莫斯科电影学院和布拉格等电影院校。建院后，他长期担任主管教学和行政工作的副院长，并曾兼任党委书记，主持全面工作。他苦心搜寻毛泽东的字体，拼出延安时期毛泽东给鲁艺的题词：“紧张、严肃、刻苦、虚心”挂在校内，为此在文革时期遭受批判，被诬篡改毛主席的“抗大校训”而蒙受不白之冤，后来得到平反。1993年，在轮椅上，在他夫人高维进的协助和参与下，钟敬之同志编辑成了《延安文艺的光辉十三年 1935—1948 图片集》以此“献给毛泽东同志诞辰100周年”。他将我列为编委会委员，尽管是不称职的。1993年6月16日上午，我和延安精神研究会的李鉴同志去他家里，商谈编后的出版发行工作。1993年12月19日，在人民大会堂广西厅召开了由延安精神研究会和陕西省委宣传部共同举办的“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大会”。会上颁发了此书。

1995年是钟敬之同志参加“左联”、“剧联”，从事左翼文艺运动60周年。时逢钟敬之同志85岁寿辰，学院在5月3日举办了“辛勤的劳动，平凡的业绩”图片自传展。陈荒煤、李鉴、汪洋（北影老厂长）等同志都来观看了展览。为了这个展览，他在3月15日给我的信中反复叮嘱，活动由“老干办出面”而不要以学院的名义出面。他的这种处事低调、始终保持谦逊的品格令我感动，

深受教益。1998年1月15日，钟敬之同志不幸去世。那时我正在国外，未能见他最后一面，是为憾事。

在电影学院的历史上，有太多的人为她做出贡献。有领导、教师，也还有许多为她默默奉献的职工、工人。我实在没有能力，篇幅也不允许将他们一一写出来。但有一位也是必须提到的，尽管我没能有机会见到他。他在我去电影学院前的1975年就已驾鹤西去，我只是在2007年1月23日参加了他的诞辰百年纪念会。那就是老院长章泯同志。他是1955年夏天，电影学院筹建小组的5位成员之一。1956年7月，他被任命为新成立的北京电影学院的第一副院长（代院长主持学院工作，兼党委书记），后来任院长兼党委书记。

他是优秀的戏剧、电影理论家。他介绍外国进步戏剧理论，是最早介绍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人之一。他撰写了



章泯

《喜剧论》《悲剧论》《戏剧的法则》《导演艺术论》《表演艺术论》等理论著述。夏衍同志说：“他毕生从事理论工作，并且一贯努力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在介绍国外先进理论的同时，他还善于把理论和中国话剧的实际结合在一起，他从来不空谈什么理论。”

他是杰出的话剧导演和电影导演。上个世纪30年代，在上海，在国统区白色恐怖时期，他以精湛的现实主义导演手法相继导演了《娜拉》《钦差大臣》《大雷雨》和《罗米欧与朱丽叶》，成为左翼戏剧运动胜利的标志。四十年代，他曾导演曹禺的《家》和鲁迅的《阿Q正传》等多幕剧，编导《静静的嘉陵江》《结亲》等影片。

万事开头难。在初创时期

的电影学院，他作为一院之长，带领大家制订教育方案、教学计划，确定培养目标和招生条件；积极贯彻毛泽东的革命文艺思想，强调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重视师资队伍建设。他殚精竭虑，为电影学院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至此，我已用简报式的语言介绍了陈波儿、黎莉莉、吴印咸、罗光达、钟敬之、干学伟、章泯等几位曾经为北京电影学院的创立、发展做出过突出贡献的人。但是越写就越觉得不踏实。篇幅局限，该写的人太多，手头资料有限，又有多有少，生怕取舍失度，使历史失真。幸好，我的目的不是写人物传记，而是想以人说事，通过他们来述说电影学院的历史与传统，这样便不会造成以人

物是否在本文中或出现的先后次序来作为衡量地位高低、重要与否的标准。

历史是多面镜，传统也是多方面的。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会看到不同的色彩斑斓的画面。这里展现出来的仅仅是电影学院发展史中间处于源头的点滴人和事，他们将永远被后人赞颂！

这篇东西我写得很苦，耗时很长。左翼电影已是八九十年前的事情了，而我在电影学院仅仅是近二十几年的事。我没有那许多经历，而当年叱咤风云的一些人物，现在又多已不在人世。我只能从文字中去寻觅他们的足迹。我重新翻看吴印咸、钟敬之、罗光达、黎莉莉等老同志送给我的留有签名

的他们的著作、资料，我一遍遍地翻查《北京电影学院学报》《院志》，到清华大学图书馆查阅、复印资料，做笔记。我越查、越看，越是对那些曾经对我国的电影事业，对于北京电影学院的创建、发展做出过许许多多贡献的先人们充满了无限的爱戴与敬意。作此拙文也算是对他们的一个纪念吧！



1995年9月北电召开的“参加抗日战争老同志座谈会”（前排右1：欧阳沃秋，右2：邸力，右3：赵明，右4：罗光达。后排左5：王凤生，左8：吴文英）